

# 批评话语分析的客观性与科学性评述

郭庆民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批评话语分析(CDA)经常被指缺乏明晰性、客观性、可靠性和可验证性,这等于否定了其科学性。通过梳理和评述CDA的几个重要理念和主张,本文试图说明:通过遵循一些基本的科学原则和明晰的操作步骤,获得充分的语言数据,并系统地利用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和证据,我们就能使自己的结论得到交叉检验,使之变得可验证,赋予它们真理价值。这样,我们能大幅度提高CDA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关键词:** 批评话语分析; 科学原则; 明晰的研究步骤; 客观性; 科学性

DOI:10.13458/j.cnki.flatt.004295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038(2016)05-0069-09

## 1. 引言

要探讨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我们必须回答两个基本问题。

从知识的性质来看,CDA理论到底产生的是客观知识,抑或仅仅是一种态度和意识形态视角?如果像有些CDA学者所主张的那样,任何知识都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而存在,那么这种知识的普遍性和科学价值就值得怀疑,它对于我们判断好与坏就缺乏重要的实用价值。如果是这样,社会正义就失去了乔姆斯基所说的绝对价值基础。在他看来,可靠的正义概念的形成,必须基于人的本质属性和人的基本社会良知,而这种良知或直觉知识是“人的本性中一个基本组成部分”。(Chomsky 2006: 4)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CDA遵循的步骤是不是科学的?它得出的结论是否可验证?辛斌和高小丽(2013)提到Stubbs和Verschuereen的观点,前者认为CDA缺乏“分析的明晰性、客观性、可靠性和可验证性”,后者认为CDA表达的经常是“缺乏证据支持的评价立场”。辛斌(2008)指出,CDA在分析方法的系统性和有效性、分析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上存在问题。

Johnstone(2008: xiii)等认为,话语分析是一套跨学科的分析方法,而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基于此,本文作者认为,既然它是一套方法,就应该由明晰的、可操作的分析步骤构成。通过严格把握这些环节和步骤,遵循一些基本的科学原则,并借鉴跨学科的研究成果与证据,我们能最大限度地提高CDA的科学性,增强其结论的有效性,赋予它们以真理价值。

本文通过评述CDA的几个核心理念和主张,来探讨提高其客观性和科学性的有效途径。

## 2. 话语与现实: CDA的相对主义立场

批评话语分析主要探讨语言与权力、意识形态、社会结构等之间的辩证关系。van Di-

作者简介: 郭庆民 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语言学 话语分析 语言与政治。作者邮箱: guoqm@ruc.edu.cn

jk(2001:352)指出:CDA“主要研究社会权力的滥用、支配力、不平等在社会政治环境下如何通过语篇和谈话得以实现、再生产、或受到抵制”。在CDA看来,控制话题、话语方向、话语内容及其表达和理解方式,都是运用权力的表现。话语生产者通过各种语法、语篇和语境手段,来塑造话语接受者的信念、见解和知识结构,以达到规训其话语和行为的政治目的。

据此,CDA的一个基本假设是:话语之外不存在现实,或者说“现实”仅存在于话语中,而在话语的世界里,我们看到的经常是不同的话语生产者对同一个社会现实的不同描述方式。这样,为了弄清这些被创造出来的“现实”的本质,就有必要对话语本身以及它与现实的关系进行分析,以便揭示藏匿在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认清话语所产生的社会效果。

这显然是一种相对主义立场。就话语分析而言,Johnstone(2008:28)认为广义的相对主义指:不同的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这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社会心理;他们共有的信念和社会规范体系存在差别,他们有不同的语言。从这一定义来看,广义的相对主义实际上包括传统上所说的“文化相对主义”和“语言学的相对主义”。

二者均可以追溯到德国思想家、语言学家洪堡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论述。他指出,语言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其特点和结构反映说话者的个性和文化,每一种语言都可能隐含着一种世界观。洪堡(2009:25)说,

语言发生的真正原因在于人类的本性之中,对于人类精神力量的发展,语言是必不可缺的;对于世界观的形成,语言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个人只有使自己的思维与他人的、集体的思维建立起清晰明确的联系,才能形成对世界的看法。

萨丕尔和沃尔夫在语言学上系统地阐释了这一相对主义立场,Sapir(见刘润清,1988:184-185)指出“人类不仅是生活在一个客观世界里,也不仅是像我们平常所理解的那样生活在社会活动的世界里,他们更多地受到特定语言的支配,而这种语言已经成为其社会的表达媒介。”这就是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虽然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的语言观受到洪堡的直接影响。

CDA理论的一种极端相对主义立场认为,知识是在特定话语结构下产生的,不存在脱离语境的客观知识,即任何知识都因为没有可以依据的现实而不具备真理性。van Dijk(2011a:33)断定,“传统认识论把知识定义为‘被证实为真的信念’(justified true belief),这是不够的……”他认为,对知识的任何定义,都应该考虑到依据某个社会的知识标准被这个社会广泛接受的信念。问题是,如果我们认为所有的“现实(reality)”都不是客观存在的,所有的“真理”都是话语创造的结果,那么,“真理”到底存在不存在,判断“真理”的标准又是什么?或者退一步说:我们能否说有些陈述比其他陈述更忠实地反映了客观现实,从而更接近真理?具体到话语分析而言,我们不禁要问:当话语分析者对话语文本、话语生产者和接受者进行分析时,他自己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还是同一组话语的参与者或再生产者?如果他的分析被认为是主观的,他通常在哪个层面上可能如此?他如何克服这种主观性分析,寻找到客观性基础?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弄清CDA的学科性质与研究目的。

笔者认为,如果 CDA 想摆脱极端相对主义的立场,如果它自称是一门科学或是一套科学的分析方法,那么,它就应该遵循基本的科学原则和明晰的步骤,使之产生的话语接近或符合客观现实,具有真理价值。这样,它才能实现它最终的研究目的——沿着符合人性发展的方向对现存话语结构和社会结构进行改造,因为只有符合真理要求的思想,才能推动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

### 3. CDA 的学科性质与研究目的: 描述与批评

就其学科性质而言,CDA 是一种社会批评理论。批评理论千差万别,但它们几乎都认为在社会结构中存在着权力的不平衡,其中充满不同程度的“支配力、剥削、斗争、压迫和权力”(Johnstone 2008: 28)。而 CDA “旨在批判性地研究被语言(或话语)表达、指称、建构、合法化等的社会不平等”。(Wodak & Meyer 2001: 2)

但是,如果 CDA 仅仅是一种批评理论,它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就会大打折扣。作为语言研究,它又应该是描述性的(descriptive),只不过它不满足于纯粹的语言描述。无论哪种语言理论,都既强调描述的充分性又强调解释的充分性(explanatory adequacy)。生成语法所谓“解释的充分性”涉及语言的初始状态(initial state)或普遍语法,功能语法涉及语言的使用或语境对语言行为的塑造作用;而 CDA 则认为,要满足“解释的充分性”,就需要“揭示话语实践在维护不平等权力关系上的作用,其整体目标在于利用批评话语分析的成果,为实现彻底的社会变革而斗争”(Jørgensen & Phillips 2004: 64)。问题是,一个缺乏客观性和科学性的理论能有效地指导改造社会的实践吗?

抛开他们在解释的充分性上的不同主张不说,所有语言理论都同意语言研究首先应该是描述性的。CDA 的代表人物 Fairclough (1995: 27) 也主张,CDA 应该从对语言和语篇的具体描述开始,他强调对语言的具体使用进行分析,其中特别强调对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研究,把文本“历史化(historicize)”。而福柯、拉克劳(Ernesto Laclau)等则更多地把话语看作是人们谈论世界的规则和方式,并强调不同方式之间通过斗争来获得霸权地位。例如,对福柯来说,“话语”是“一组陈述(a group of statements)”,是通过语言对知识进行的再生产(Hall 2001: 72),他“感兴趣的与其说是实际生产出的话语或语篇,不如说是产生特定话语和语篇的社会规则和结构”(Mills, 1997: 7)。但是,福柯和拉克劳都不是纯粹的语言学家,他们关心更多是“批评”,而不是对语言的具体“描述”,因此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笔者认为,就其学科性质而言,基于语言学研究的 CDA 应该更多地关心对语言和语篇的“描述”,以便把“批评”建立在更客观的基础之上。Fairclough(1995)把话语分析分作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他把话语分析中对语言的分析称作“描述性的”或“非解释性的”(non-explanatory),或者说仅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解释。具体来说,“描述”是非解释性的,它关心的是话语的形式特征,在这个层面上,即使产生解释,也不是“批评性的”。CDA 的“批评性”主要表现在宏观层面,即它通过对占主导地位的话语进行批评性分析,解释意识形态被“自然化(naturalization)”的过程,并致力于对语言进行“去自然化”(de-

naturalization) 处理,让人们看一看意识形态是怎样转化为看似非意识形态的“常识”的 (Fairclough, 1995: 27-46)。Machin 和 Mayr (2012: 5) 认为,“‘批评的’这个词意指将语言做‘去自然化’处理,……以便揭示语篇中隐藏的那种权力利益。”Wood 和 Kroger (2000: x) 也把 CDA 分作两个层面,在语言层面上涉及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在第二个层面上涉及语言的性质以及语言与其他社会科学的核心问题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CDA 学者的一个共识是:在描述层面,CDA 完全可以通过语言数据把自己的分析客观化。看来,问题主要存在于第二个层面。许多学者之所以认为 CDA 是一种主观分析,也主要指的是它在“批评”层面上的分析。而且,CDA 的跨学科性也主要体现在这个层面。但是,笔者认为,即使在解释层面上,CDA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客观性要求。它所要做的是充分利用其跨学科性质,借鉴政治科学、社会学、人类学、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和证据,在交叉对比中检验其结论的真伪。

#### 4. CDA 存在夸大意识形态作用的倾向

上文提到,大多数学者认为,我们能谈论的世界不是客观实在,而只能是话语建构的世界。比如 Teubert (2010: 116) 指出,“我们所拥有的全部就是语篇的实在,它们所表达的意义以及其中所包含的知识。”Chilton 研究了政治话语,他指出,在政治对话中,政治家通过将自己的话语“合法化”(legitimising) 来推广他们对世界的认识,而其对手则通过将之“去合法化”(delegitimising) 来质疑这种认识的真理性和真实性(Chilton, 2004: 23)。二者都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不惜扭曲现实。

但是也有学者似乎不以为然。例如, Fairclough 区分了“意识形态话语”和“非意识形态话语”(non-ideological discourse),认为话语分析者生成的话语应该属于后者。在谈到意识形态与话语的关系时, Fairclough (1995: 27) 指出,“在我看来,社会制度中包含各种‘意识形态-话语结构’(ideological-discursive formations 或 IDFs),它们与这个社会体制中各个族群相联系。其中有一个 IDF 通常显然占据主导地位。”它能使意识形态“自然化”,CDA 的主要任务就是“去自然化”。这里,他显然认为,我们通过系统的分析,可以复原话语的本来面目,达到“去意识形态”的目的。这样,他实际上承认了,确实存在一个话语之外的客观世界。

应该指出,不是所有的话语都是特定意识形态——特别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产物。Wodak (1996: 18) 也把意识形态看作是“描述和建构社会的特定方式,认为这些方式造成并维系着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支配关系和操控关系”。但她和 Fairclough 一样,认为并非所有的话语都是意识形态的产物。Fairclough (1992: 91) 明确指出,只有有意识地造成并维系权力不平衡的话语才具有意识形态性质。言外之意,话语到底是不是具有意识形态性质取决于话语的使用和目的,而不是话语本身。

比如,某位教师撰文发表了对我国教育现状以及改革思路的见解。他引用了孔子、柏拉图、马克思、密尔、乔姆斯基、杜威等的教育思想,并结合自己的教育实践提出了独特的见解。那么他的“意识形态”视角到底是东方传统的还是西方传统的?其教育观属于积极自由还是消极自由的范畴?他是在宣扬集体主义还是个人至上主

义的价值观?也许都不是。因为他可能首先没有系统地遵循哪种价值观而形成自己的教育观,其次,他的目的也不是为了维系某种权力,他甚至可能没有试图达到“去意识形态化”(de-ideologising)的目的。如果他的研究是基于对现实的客观描述,依照明晰的可操作步骤,那么,其结论就具有客观性,可供其他教师借鉴,在实践中检验其真理性。

CDA 经常有夸大意识形态作用的倾向。这是不可取的,也是不符合当代社会特点的。在当代社会,网络的普及早已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思想解放力量,意识形态的灌输和操控在任何民主国家正在失去其效力。在这样一个存在广泛言论自由的、鼓励思想多样化的时代,任何一种新思想的产生,都可能对旧思想体系和现行思维模式的突破。

事实上,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Abercrombie 等(1980: 1)就怀疑所谓统一的“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存在,他们认为,即便它存在,人们通常能够抵制或拒斥这种东西。Fairclough 也指出,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一方面维系着现存话语结构,但是另一方面也通过新话语的使用来试图摆脱现存话语结构(Fairclough, 1992: 66)。这种努力是人类思想不断进步的动力,推动社会向着乔姆斯基所说的更符合人性的方向发展。可见,“非意识形态”话语是存在的,CDA 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用符合真理、符合人性发展规律的话语,来揭示意识形态话语的欺骗性,实现对话语的改造,进而实现对社会的改造。这意味着,即使在批评层面上,CDA 的分析也能满足“客观性”的要求,达到“去意识形态化”、揭示真理的目的。

##### 5. CDA 的客观性与它应遵循的原则

笔者认为,基于语言学的 CDA 应该满足客观性要求。这里所谓“客观”,主要指的是我们对世界的描述和解释应该符合实际情况,或者至少是,某些描述和解释比其他描述和解释更好地反映现实世界的状况。Habermas 指出,检验一个陈述的真伪不在于这个陈述本身,“如果一个陈述与实际状态或事实相符,我们才能称之为真”(Habermas 2001: 86)。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斯也指出,观念本身无所谓真,所谓“真(truth)”,指的是“观念与实在相符,正如假指它们之间不相符一样”(James 2002: v)。具体到 CDA 来讲,这意味着其分析结果或结论尽量与实际状况相符,经得起检验或反复验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应该遵循一些明晰的科学原则和步骤。

从其研究对象上来说,CDA 具有满足这一客观性要求的可能性。CDA 理论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分析话语文本的语法和语篇结构特点,以及其中蕴藏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视角;(2)分析社会结构或话语结构与话语文本之间的相互影响;(3)分析话语结构产生的根源及其在不同社会政治领域里的表现形式;(4)研究话语生产者的社会认知和心理认知倾向如何塑造话语文本;(5)研究话语接受者的思想意识如何受到话语文本的塑造,致使他们成为权力操控的对象。

从以上五个方面来看,话语分析者可以利用语言学和跨学科的分析方法和成果,有充分的机会把自己的结论建立在更客观的基础之上。这需要从几个层面上来看待 CDA(见

Jørgensen & Phillips 2004) ,并由此确立它应该遵循的原则。

在语言层面 ,CDA 研究者必须依照语言科学的研究方法 ,对话语文本的语法和语篇特点加以完整地描述 ,获得可靠、充分的语言数据。这里所谓“充分” ,不仅仅指对所关注的语篇做透彻的语言分析和归纳 ,而且要把所取得的数据放到更广泛的语言数据中去核实 ,利用互文性的方法检验其充分性 ,剔除偶然性和个性化特征。

在语言与社会结构层面 ,CDA 研究者切忌仅仅根据有限的语言数据得出广泛的社会结论。他可以借助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系统地说明语言与社会结构各个层面的有机联系 ,从而对话语是否忠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进行鉴别。在讨论他所说的“五个原则”时 ,Blommaert( 2005: 14) 强调,“在构建批判性的语言科学( critical science of language) 时 ,我们至少应该考量一下我们可利用的东西” ,他所说的“可利用的东西” ,主要指人类学和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在语言与社会认知层面 ,CDA 研究者可以使用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实验方法和研究成果 ,来分析特定社会群体系统地看待和谈论某个话题的方式 ,揭示他们使用话语的心理认知基础并测量其话语效果 ,从而对自己所关注的语篇反映社会心理和社会认知的方式做出更广泛的概括。

在语言与政治层面 ,CDA 研究者需要借助社会学、政治科学等领域的理论和研究成果 ,对自己使用“权力”、“意识形态”、“社会控制”等概念的方式做出具体的界定。比如 ,他需要首先说明“权力”的来源、性质和运用方式 ,然后再具体解释他所关注的语篇或话语在这三个方面所体现的权力关系 ,从而揭示话语创造者的社会政治意图。

在得出社会政治分析的结论之后 ,为了进一步保障其结论的客观性 ,CDA 研究者应该对他所获得的知识性质保持一种“反思态度”( Pennycook 2001: 38) 。这意味着 ,他需要采取一种科学的态度 ,指出自己的立场在哪些方面也是可以“批评的”以及自己得出的结论在解释力上的局限性。

简言之 ,无论是在描述层面 ,还是在解释层面 ,CDA 都应该运用明确的、系统性的分析方法 ,以减少分析的任意性和随机性。它应该充分利用跨学科的成果和证据 ,在更大的范围内交叉检验自己的数据和结论。这样 ,才能使其分析过程变得明晰、可复制( replicable) ,使其解释过程满足充分性要求 ,使其分析结果变得可验证 ,最大限度地保持其一致性和可证伪性。

## 6. CDA 应遵循的分析步骤

为了满足上述客观原则的要求 ,CDA 在实际分析过程中可遵循以下步骤:

第一步: 运用语言学的方法 ,对所关注的话语或语篇文本进行详尽的记录、统计和描述。

第二步: 利用互文性研究提供的方法 ,把取得的语言数据在更广泛的语篇或话语文本中进行系统的检验、对比和确认。这里 ,“更广泛的语篇或话语文本”指同一位作者的其他相关语篇或话语 ,也指其他作者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创造的同一个题材的语篇或话语。



第三步:借助社会科学和认知科学的相关理论,分析语篇创造者所处的社会语境和认知语境,其目的不仅仅是揭示语篇或话语文本如何反映他的个体认知,更重要的是指出他的个体认知在哪些方面反映了该社会对相关话题的集体认知。

第四步:借助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和证据,验证语篇或话语文本所描述的内容是否忠实地描述或反映了社会现状,据此确认该内容的真理价值。

第五步:借助社会科学和政治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来解释意识形态和权力如何通过所关注的语篇和话语得以体现,分析其意识形态效果或支配力,从而揭示话语创造者的社会政治意图。

第六步:如果发现话语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视角,对该视角进行批评性分析,提出“去意识形态化”的主张和方法,但同时指出自己的主张在哪些方面也是可以被“批评的”。

在很多方面可以说,以上步骤是对 Fairclough 的三维分析模式(three-dimensional model)和 Wodak 的话语历史方法(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的细化,其目的是通过遵循明晰的步骤使分析结果变得可验证、更客观。

举例来说。由于被动语态结构具有隐藏施动者的作用,它经常成为 CDA 分析的主要语言结构之一。但是,假如由《纽约时报》刊登的某篇有关中国食品安全的文章使用了多个被动语态,我们不能匆忙得出结论说:作者有意识地利用了某种意识形态视角来报道和贬低中国的食品制造业。在获得基本的语言数据后,在描述和“批评”层面,为了保障我们的任何结论具有客观性基础,我们需要做一个系统的交叉验证。比如我们可以问自己下列问题:

(1) 该作者在谈到美国和日本的食物安全问题时,其文章在单位字数中有没有使用同等数量的被动语态结构?

(2) 该作者在正面报道中国相关问题的文章中——如果他曾写过此类文章的话,有没有使用同等数量的被动语态结构?

(3) 该作者在该文中所表达的“意识形态”视角,是不是他报道涉及中国相关问题所采取的一贯立场?

(4) 这一立场是他本人的认识偏差,还是反映美国主流社会对中国的一贯看法?

(5) 他所报道和评论的问题是否忠实地反映了中国食品安全的现状,还是他罔顾事实,对现状进行了主观夸大和扭曲?

(6) 中国人如何看待自己国家的食品安全问题,这位美国记者的报道在哪些方面与中国人自己的看法是相悖的或一致的?

(7) 美国新闻媒体的职责是什么?是揭露事实,还是引导公共舆论?作者批评中国食品安全的社会政治目的是什么?

(8) 美国读者的期望值是什么?作者是在一味地迎合美国大众读者的品味,还是抓住了中国食品安全的本质问题?

以上问题涉及描述和解释层面的一致性和系统性,对每个问题的回答都可以获得相关研究证据的支持。具体来说,前两个问题涉及对话语生产者和话语文本之间关系的分析——特别是互文性分析,涉及到作者使用被动语态结构的系统性,我们可

以用相关语言数据交叉验证作者是否在有意识地使用被动语态塑造话语接受者的视角。

第三、四个问题涉及社会认知和心理认知,涉及意识形态语言和非意识形态语言之间的区别:如果作者的观点没有系统地反映美国主流社会群体的意识形态立场,那么他的观点则可能仅仅是一种个人看法。

第五、六个问题涉及话语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作者的报道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中国食品安全的现实状况。为了验证其报道的真实性,我们可以找出食品科学领域的证据,来驳斥文章内容的可信度。

最后两个问题涉及政治问题,我们可以借助政治科学来分析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和运用方式,分析大众传媒的社会作用,揭示新闻媒体报道社会热点问题的方式和“制造共识”的机制。

系统地弄清上述问题,我们就能提高结论的有效性和客观性。

## 7. 结语

当然,应该承认,不少 CDA 学者也试图把分析过程具体化——比如 Wodak (2004: 210) 试图把她的话语历史分析法步骤化; van Dijk (2011b: 6) 也认为, CDA 研究可以采用定性的、定量的、描述的、实验的、人类学的或批评的研究方法。但是在实际分析中,特别是在“批评的”层面上,主观倾向依然严重存在。

笔者认为,不能因为 CDA 涉及社会批评、涉及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和意识形态因素,就悲观地把它看作是主观的,是不可能具有科学价值的,把其真理主张 (truth-claim) 看作是值得怀疑的。如果我们遵循上述原则和步骤,就能使我们的结论变得可验证,赋予它们真理价值。而且,我们还需要在分析中明确我们的立场和视角,并指出这种视角本身的局限性,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结论。只有这样,批评话语分析才满足了一般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要求。

## 参考文献:

- [1] Abercrombie, N., S. Hill & B. Turner. 1980. *The Dominant Ideology Thesis* [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 [2] Blommaert, J. 2005. *Discours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3] Chilton, P. 2004. *Analysing Political Discourse: Theory and Practice*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4] Chomsky, N. 2006. Human nature: Justice vs. power [A]. In J. Rajchman (ed.). *The Chomsky-Foucault Debate on Human Nature* [C]. New York: The New Press.
- [5] Fairclough, N. 1992.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6] Fairclough, N. 1995.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 [M]. London & New York: Longman.
- [7] Habermas, J. 2001. *On the Pragmatics of Social Interaction* [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8] Hall, S. 2001. Foucault: Power, knowledge and discourse [A]. In M. Wetherell, S. Taylor & S. Yates. (eds.). *Discourse Theory and Practice: A Reader* [C]. London: Sage.





- [9] James W. 2002. *The Meaning of Truth* [M].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 [10] Johnstone B. 2008. *Discourse Analysis* [M].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 [11] Jørgensen M. & L. Phillips. 2004. *Discourse Analysis as Theory and Method* [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12] Machin D. & A. Mayr. 2012. *How to Do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 Multimodal Introduction* [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13] Mills S. 1997. *Discourse*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14] Pennycook A. 2001. *Critical Applied Linguistic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M]. Mahwah: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15] Sapir E. The status of linguistics as a science [A]. 刘润清等编. 1988. 现代语言学名著选读(上册) [C]. 北京: 测绘出版社.
- [16] Teubert W. 2010. *Meaning Discourse and Societ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7] van Dijk A. 2001.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 In D. Schiffrin, D. Tannen & H. Hamilton (eds.). *The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C].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 [18] van Dijk A. 2011a. Discourse knowledge power and politics: Towards critical epistemic discourse analysis [A]. In C. Hart (ed.).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in Context and Cognition*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19] van Dijk A. 2011b. Introduction: The study of discourse [A]. In T. van Dijk (ed.). *Discourse Studies: A Multidisciplinary Introduction* [C].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20] Wodak R. 1996. *Disorders of Discourse* [M]. London: Longman.
- [21] Wodak R. 2004.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 In C. Seale, G. Gobo, J. Gubrium & D. Silverman (eds.). *Qualitative Research Practice* [C].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22] Wodak R. & M. Meyer. 2001.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23] Wood A. & R. Kroger. 2000. *Doing Discourse Analysis: Methods for Studying Action in Talk and Text* [M]. California &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24] 洪堡. 2009. 姚小平译. 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25] 辛斌. 2008. 批评话语分析: 批评与反思 [J]. 外语学刊, (6): 63 - 70.
- [26] 辛斌 高小丽. 2013. 批评话语分析: 目标、方法与动态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4): 1 - 5.

pieces of American presidential speeches on the Afghanistan war. The study reveals how the discursive strategies of legitimation construct a righteous “us” and an evil “the other” in an effort to construct a cruel and controversial war as a legitimate action with noble purposes, reasonable motivation and wide support.

Key Words: legitimation; discursive strategie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discourse of war

**A Review of the Objectivity and Scientificity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p. 69. *GUO Qingm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is often criticized for lacking explicitness, objectivity, reliability and verifiability, thus lacking scientificity. By clarifying and reviewing some major concepts and claims of CDA, the present paper tries to argue that if we follow some basic scientific principles and explicit operational procedures, obtain adequate linguistic data and make systematic use of multidisciplinary achievements and evidence, we can have our conclusions cross-examined to make them verifiable, thus endowing them with truth value. In this way, we can tremendously enhance the objectivity and scientificity of CDA.

Key Words: CDA; scientific principles; explicit research procedure; objectivity; scientificity

**An Evolutionary Psychological Study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p. 78. *ZHANG Tianwei*

The paper reviews and introduces the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based on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The author maintains that the rationale of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EP and CDA is modularity and coercion. Drawing on Hart's study (2010) and the EP theory, the paper analyzes the discourse strategies of news discourses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including referential, predication, proximation and legitimizing strategies. It is argued that the theme of the integration of EP and CDA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 between discourse strategies and modularity, and that their interaction is mainly realized by way of activation and operation. In other words, we can activate modules of Cheater-Detection and Emotion by way of predication strategy, or operate module of Logico-Rhetorical by way of legitimizing strategy.

Key Words: CDA;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Modularity; discourse strategy

**Relation Inquiry of Tertiary EFL Teachers' Knowledge and Their Teaching Autonomy**, p. 88. *LI Siqing & CHEN Jianlin*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interpret teaching autonomy in view of teacher knowledge and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of the dual factors. The authors firstly selected five teachers as the research cases and collected their knowledge data through interviews and class observations. The knowledge from the interview data was regarded as the descriptive one and the knowledge by observation as the external. The study then conducte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dual knowledge. It is found that the case teachers' descriptive knowledge is correlated with their observational one and that their knowledge shapes their teaching autonomy to some extent. It is argued that EFL teachers' knowledge has a crucial effect on their teaching autonomy, and that teacher's knowledge can be regarded as a practical perspective in teaching autonomy inquiry.

Key Words: teacher autonomy; teaching autonomy; EFL teaching; EFL teachers' knowledge

**A Study on University EFL Teacher Engagement with Discipline and Literature: The Activity Theory Perspective**, p. 97. *MENG Chunguo & CHEN Liping*

